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新结构经济学工作论文

Working Paper Series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No.C2020004

2020-05-04

发展的机制：以比较优势战略释放后发优势 ——与樊纲教授商榷

摘要：樊纲教授最近发表的两篇论文认为，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继起的互不相干的两个优势，并认为中国过去的高速发展难以用比较优势加以解释。我们认为，虽然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并非不同发展阶段上继起的互不相干的两件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唯有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才能顺利、充分地释放后发优势。这正是破解樊纲教授所说的“发展悖论”的“发展的机制”。

关键词：比较优势 后发优势 发展经济学 中国经济

本工作论文系列是新结构经济学最新的尚未在学术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目的在于学术讨论与评论，并不代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官方意见。本系列论文拒绝接受已发表或期刊已接收论文投稿，文责作者自负。本文由“NSE A0 宏观与经济增长 小组”审核。

刘培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peilin.liu@qq.com

刘孟德，杜兰大学，mengde0321@126.com

发展的机制：以比较优势战略释放后发优势

——与樊纲教授商榷

刘培林 刘孟德

联系方式

刘培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peilin.liu@qq.com

刘孟德，杜兰大学，mengde0321@126.com

发展的机制：以比较优势战略释放后发优势

——与樊纲教授商榷

摘要：樊纲教授最近发表的两篇论文认为，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继起的互不相干的两个优势，并认为中国过去的高速发展难以用比较优势加以解释。我们认为，虽然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并非不同发展阶段上继起的互不相干的两件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唯有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才能顺利、充分地释放后发优势。这正是破解樊纲教授所说的“发展悖论”的“发展的机制”。

关键词：比较优势 后发优势 发展经济学 中国经济

一、引言

樊纲教授最近发表了两篇关于发展经济学研究主题和内容的重要论文。一篇是“‘发展悖论’与‘发展要素’——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案例”（樊纲，2019）；另一篇是“‘发展悖论’与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樊纲，2020）。两篇论文立足于对现实的观察，提出了不少重要观点。两篇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找到破解“发展悖论”的途径。按照樊纲教授的论述，这一悖论也是“发展经济学要研究的特殊问题：发展中国家处处落后，处处不如人，但还要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具体而言，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因为落后而导致的区别于发达国家的六类“特征性问题”。为了破解“发展悖论”和这些“特征性问题”，樊纲教授的论文进一步指出，劳动、资本、技术、制度等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一般意义上“增长要素”；而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本土优势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发展要素”，其中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是比较重要的两种“相对优势”。

樊纲教授的两篇重要文章，框架宏大，涉及到很多问题。我们赞同两篇文章的很多观点。比如，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从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相对关系的角度入手加以深化。再如，“经济结构取决于要素结构”。又如，“要想有更好的、更高级的经济结构，你需要去努力发展和增长那些优质的要素……而不是像大跃进那样，以为只要大炼钢铁，有了一个经济结构的飞跃，就可以成为强国。由于要素结构没有变化，这种赶超的结果只能是浪费大量资源，并不能真正改变经济结构……最终是不可持久的。”¹还比如，“我们的确也到了大力提升自主创新的阶段”。²

但是我们不同意樊纲教授的另一一些观点。比如，他把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仅仅等同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他在文章（樊纲，2019）中说：

¹ 樊纲（2019），150页。

² 樊纲（2020），38页。

客观上说，一个落后国家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只有廉价劳动力这一个发展要素。但是，如果只靠这个要素来支撑增长，增长不会持续，也解释不了像中国这样的 40 年的持续增长。中国还是人口大国，我们也逐渐遇到了劳动力短缺，其他人口小国用不了几年，劳动力就会耗尽，还怎么发展？现实中，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因为仅仅发挥了比较优势，所以没过多久，经济就出现了停滞，经济增长未能实现一个长期持续从而真正缩小差距的过程。所以，要解释中国最近 20 多年的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已经不是比较优势。³

又如，樊纲教授在两篇文章中把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作为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上继起的互不相干的两个事情。比如他认为：

（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第一阶段，纯粹依靠比较优势，挣得“第一桶金”，从而可以开始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可以更多地投资教育。第二阶段，进入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同时起作用的时期。第三阶段，继续学习模仿，发挥后发优势，同时也到了加大自主创新的阶段了。⁴

我们认为，樊纲教授这些观点误解了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现实含义，有必要加以澄清。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固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我们看来，比较优势并不仅仅对应着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并非不同发展阶段上继起的互不想干的两件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只有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顺利且充分地释放后发优势。

这样的讨论虽涉及到对这些概念内涵的界定，但并非纯然基于不同的内涵界定而展开的概念之争，而是关乎几十亿人口生活水平的重要问题，有着重要实践意义。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World Bank, 2019），2018 年全球低收入、下中等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总人口分别为 7 亿、30 亿和 27 亿，分别占全球总人口的 9%、40% 和 35%。而且，即使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标准衡量的高收入国家中，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为数也不少，这是因为目前世界银行沿用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收入水平，在 2018 年为 12375 美元，仅相当于同年全球平均收入水平的 1.1 倍。2018 年高收入行列经济体所有人口平均收入水平接近 4.5 万美元，如果我们以 2.5 万美元作为界限对高收入国家进一步分为两个小类，那么，收入水平低于这个界限的高收入经济体有 24 个，生活在其中的人口也多达 1.7 亿。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些国家和人口也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由这些数据可见，找到破解“发展悖论”的“发展机制”，是关乎 65 多亿人口生活水平的重大问题。

本文分六个部分。第二部分介绍“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战略”，说明比较优势既意味着同一时间点上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要素禀赋结构之间的横向比较，也意味着给定经济体自身在不同时间点上的纵向比较；第三部分介绍“比较优势战略”和“后发优势”之间的关系，说明只有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顺利、充分地释放后发优势，而且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也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否则其经济就不能以潜在的最高速度增长；第四部分围绕第三部分内容可能引发的一些疑问，进一步阐述“比较优势战略”和“后发优势”之间的关系；第五部分论述了落后国家快速发展对全球而言是正和而非零和博弈，这部分的讨论有助于发达国家形成看待发展中国家的正确态度；最后是结论。

³ 樊纲（2019），150 页。

⁴ 樊纲（2019），150 页。括号里的内容为我们所加。

二、比较优势与比较优势战略

比较优势所比较的，是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有多种，比如物质资本、土地和矿产资源、劳动力等等。各种要素禀赋中，任意两种都有相对的比例，如物质资本相对于土地和矿产资源的比例，物质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比例，土地和矿产资源相对于劳动力的比例。这些比例就构成了要素禀赋结构。这些要素禀赋结构中最重要的一种，是物质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比例。

所有这些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有两方面含义。一个是同一个时间点上各国之间的横向比较，比如，2017年各国人均物质资本水平有高有低，美国高于中国的水平，中国高于印度的水平。另一个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间点上的纵向比较，人均资本水平有时高有时低，通常是现在比过去高，未来比现在高，中国2017年的水平高于2000年的水平。当然，也有一些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因特殊原因而导致人均物质资本水平随时间推移而减少，比如战争和自然灾害导致物质资本短期内大量灭失，或人口增速远超物质资本积累速度，都会导致这种现象。

横向和纵向两种“比较”也就引申出关于比较优势战略的两方面内涵。从横向看，如果某时间点甲国人均物质资本水平高于乙国，那么前者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生产工艺技术结构的物质资本密集度，就应该高于后者。纵向看，一国人均物质资本水平随时间推移而提高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生产工艺技术结构的物质资本密集度，也须相应提高。

基于上述讨论，可以进一步指出关于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战略的两个含义。第一，比较优势原理虽然因为贸易理论而广为周知，虽然决定着开放条件下国家之间分工格局，但事实上同样决定着封闭经济条件下单个经济体合理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的情形。比较优势所比较的要素禀赋结构，实际上刻画了一个经济体的预算约束和要素相对价格（Lin and Wang, 2017）。密集使用相对丰裕从而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是成本最小化的必然要求，是所有要素都能得以充分利用的必然要求。这可以说是经济学当中的铁律，无论分析对象是开放经济还是封闭经济，这个规律都成立。

第二，比较优势从来就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概念。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内在的要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工艺技术的物质资本密集度，须随着人均物质资本水平提升而相应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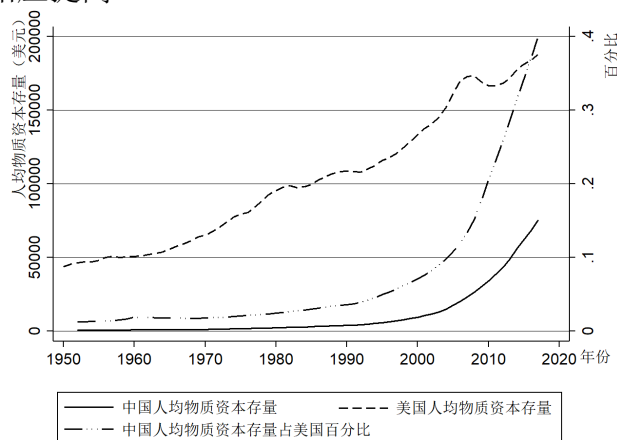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和美国的人均物质资本绝对和相对水平

资料来源: Feenstra, Inklaar, and Timmer (2015)

图 1 反映了中国和美国人均物质资本的积累过程。从中可以得出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到目前为止的每个年份，中国人均物质资本均低于美国的水平。这意味着，如果按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的话，这些年份中国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资本密集度应该低于美国。这也是实际发生的情况。二是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物质资本持续积累。这意味着，如果按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的话，中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资本密集度也应逐步提高。同理，由于美国人均物质资本也在逐步积累，美国如果顺应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的话，其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资本密集度也应该逐步提高。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物质资本积累速度比美国快，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和美国均按照比较优势战略发展各自经济的话，中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资本密集度提高速度，应该比美国更快。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落后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会逐步演变。越到发展的中后期，资本密集产业就越具有比较优势，而劳动密集产业则越来越丧失比较优势。

但是，按照樊纲教授的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只是“劳动力成本低，可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获得劳动成本较低的竞争优势，为落后国家挣得‘第一桶金’。”⁵“比较优势是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产生的竞争力。但是这种竞争力只能存在于一部分产业当中，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当中，而且只是在比较低端的、不需要很高技能的组装与服务环节上。”⁶按照这些表述，樊纲教授似乎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且只能是劳动密集产业，当这个国家人均资本积累、发展水平提高之后，如果发展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就不再符合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了。

我们认为，樊纲教授这种看法是对比较优势的静态和片面的理解，值得商榷。如果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全部含义仅仅是劳动力丰富、工资低的话，那么，就完全没必要大费周章引入比较优势这个概念。我们不否认发展中国家在较低发展阶段上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劳动密集产业和产品上。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随着发展水平提高，资本积累速度超过劳动力增长速度而导致劳动力逐步短缺的话，并不意味着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彻底消失了，而意味着比较优势的具体体现变化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将越来越具有比较优势，而发展早期所倚重的劳动密集产业将逐渐丧失比较优势。

也就是说，任何经济体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都有自己相应的比较优势，只不过比较优势的具体体现，在有规律地变化。变化的规律是，随着人均物质资本水平越高，体现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生产技术结构的资本密集度越高、劳动密集度越低。

三、唯有比较优势战略才能顺利地而充分地释放后发优势

上面介绍了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含义。发展中国家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目的就在于顺利且充分地释放自身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

所谓后发优势的含义，正如樊纲教授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就是“作为落后国家，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或模仿前人所积累的大量技术，学到别人在之前发

⁵ 樊纲 (2019), 150 页。

⁶ 樊纲 (2019), 150 页。

展过程当中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可以少走弯路，多走捷径。”⁷ “就是通过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通过国际交流，得以把发达国家的知识‘外溢’到我们这个地方，外溢到落后国家的经济当中，通过学习和模仿，尽快掌握人类已有的一些知识，取得较快的进步。”⁸

这个“少走弯路，多走捷径”的技术“外溢”过程，实际上就是相对落后国家模仿相对先进国家技术的过程。模仿过程中，相对落后国家无需像发达国家当初那样，在众多技术路线中试错，在众多技术上可行的产品中识别哪些商业价值更高。这样，通过模仿，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在几十年时间里快速掌握发达国家在上百年甚至几百年里积累的技术和成功的商业模式。而且，相对落后国家模仿这些技术所支付的成本，也会低于相对发达国家当初研发这些技术所支付的成本。

从上面分析可以得出关于后发优势的两个推论。横向看，某时点一国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越落后，则前者所具有的后发优势越大。纵向看，一国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如随着时间推移而缩小，则前者的后发优势会相应缩小。

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确如樊纲教授文章所认为的那样，是两个不同的、相对独立的概念。但两者并非完全割裂的，其内在的紧密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个落后经济体和一个发达经济体之间，在人均资本拥有量刻画的比较优势上的差别越大，则前者的后发优势也就越大。这也意味着，两个经济体之间如果人均物质资本水平相当，则两者相互之间几乎没有后发优势；反过来，如果两个经济体之间相互没有后发优势的话，它们的人均物质资本水平也不会有太大差距。

除这一点外，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之间紧密关系的另一个更重要表现是，只有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顺利地、充分地释放后发优势；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则不能。这是因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之下，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生产技术结构的资本密集度与整个社会的人均资本水平相适应，成本能够最小化，企业能够获得最大剩余，所有的生产要素都能够被充分利用起来，整个社会的总资本能够以潜在的最快速度积累，人均物质资本水平才能以潜在的最快速度提升，从而以潜在的最快速度攀升技术阶梯。相反，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比如赶超战略之下，优先发展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生产技术结构的资本密集度超越于整个社会的人均资本水平，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成本不能最小化，不能获得最大剩余，难以在竞争性市场中生存（Lin and Tan, 1999; Lin, 2003）。这种情况下，为发展这些超越整个社会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政府必须予以保护和补贴，或授予它们垄断权，或提供低价资本、原材料和土地。这些扭曲创造了租金，刺激了寻租、贪污和腐败。最终，整个社会资本积累速度低于潜在的最快水平，人均资本水平提升速度也就低于潜在的最高水平，该经济体攀登技术阶梯的速度也就低于潜在的最快水平（林毅夫，2012）。

由此可见，后发优势只有通过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顺利而充分地释放出来，转化为推动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如果不采取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那么，后发优势就仅仅是潜在的优势，无法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发展动力。事实上，樊纲教授自己在论文中也指出了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

⁷ 樊纲（2020），37页。

⁸ 樊纲（2019），150页。

过去人们知道 GDP 只是一个表面的指标，所以需要更多关注经济结构，较好的经济结构才会产生价值较高的收入。但是，经济结构取决于要素结构，或者说是‘要素禀赋结构’（禀赋在这里的意思是到今天为止你拥有的东西），包括技术水平、体制效率、人力资本结构以及资本积累水平。要想有更好的、更高级的经济结构，你需要去努力发展和增长那些优质的要素，改善这些要素结构，这样才能够真正获得持久的增长。而不是像大跃进那样，以为只要大炼钢铁，有了一个经济结构的飞跃，就可以成为强国。由于要素结构没有变化，这种赶超的结果只能是浪费大量资源，并不能真正改变经济结构。如果基础性的要素结构没有改变，而只是经济结构人为地发生短期的改变，则最终是不可持久的。⁹

但是，樊纲教授却又把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两者割裂开，且分别视为发展早期和中后期时间上继起但却相互独立的优势。他在文章中说：

要解释中国最近 20 多年的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已经不是比较优势，而是“后发优势”。因为在后面的这 20 年里，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是各行各业的发展，看到了技术的进步，看到了高科技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所以，要注意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差别。比较优势是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产生的竞争力。但是这种竞争力只能存在于一部分产业当中，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当中，而且只是在比较低端的、不需要很高技能的组装与服务环节上。而后发优势则不一样，它的本质是以较低的学习成本和试错成本去缩短差距，它可以发生在所有的领域、所有的产业当中，使得经济取得全面的生长，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而且它不仅在生产活动中存在，在诸如制度改进等领域中也存在。作为后来者，通过开放的过程，可以学习、模仿、引进、吸收，使我们的知识和技术的生长可以更快地接近世界前沿。在中国 40 年来的高增长中，后来的这 20 年应该说越来越多是依靠这个后发优势。¹⁰

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我们认为，第一，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水平很低的发展早期，同样有可资利用的后发优势，甚至如前面指出的那样，越是发展早期，后发优势越大。中国过去 40 年中，不仅仅是后来这 20 年利用了后发优势，前面的 20 年也利用了后发优势。事实上，樊纲（2020）的论文中也指出，在发展的“第二阶段，进入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同时起作用的时期。这里的前提是要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就开始对外开放，学习模仿，主动地受益于“知识外溢”，积以时日，才能在后面的阶段上接续发展。”¹¹那么，第一阶段的学习模仿不正是后发优势的释放吗？

第二，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本世纪头 20 年利用后发优势，根本原因是中国在上世纪末的 20 年中以比较优势战略成功地释放了那个阶段上的后发优势，实现了很大程度的技术追赶，把技术水平提高到了一定水平。后发优势，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程度由低到高的技术谱系。设想一下，如果上世纪末的 20 年里中国仅仅靠劳动密集产业的规模扩张，而未把后发优势的技术谱系中那些较低水平的技术吸收利用的话，怎么可能一下子“跳跃到”本世纪头 20 年时间里

⁹ 樊纲（2019），149-150 页。

¹⁰ 樊纲（2019），150 页。

¹¹ 樊纲（2020），38 页。

所吸收和利用的更高水平的技术上？上面引用的樊纲教授自己的阐述¹²，实际上也明确表达了这个意思。

第三，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的技术落差，是一个复杂程度由低到高的技术谱系。这实际上意味着，发展阶段越低，后发优势越大，这个技术谱系越宽；发展阶段越高，后发优势会越小，这个技术谱系会越缩窄到那些越来越复杂的高端技术上，而且吸收和利用这些高端技术的难度只会越来越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中，后面 20 年发展利用的后发优势所对应的技术，的确比前 20 年发展利用的后发优势所对应的技术更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前 20 年的发展中没有利用后发优势。当然，这个逻辑的一个必然推论是，未来要利用的后发优势所对应的技术的复杂度，会比过去 20 年的更高。

第四，今后要继续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发展，仍然需要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今后中国的比较优势，将越来越体现在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产品和技术上，而不再体现在劳动密集产业、产品和技术上。但这其实是比较优势具体表现的变化，恰恰是比较优势原理在今后客观条件下本来应该有的表现，并不意味着比较优势丧失了，更并不意味着比较优势原理不适用于未来的发展阶段。

第五，倘若像樊纲教授所认为的那样，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可以割裂开来，且在劳动密集产业的优势消失之后，后发优势所代表的那些高端技术立即就可以像打开龙头就来水那样流出来的话，那就不会有发展不起来的国家了。这是因为，按照樊纲教授的逻辑，如果在需要时只需要打开技术的龙头让复杂技术流出来的话，那么，简单技术的龙头岂不是更容易被打开，简单技术岂不是更容易流出来？实现经济起飞、从劳动密集产业入手启动工业化进程，岂不是易如反掌？但放眼世界，至少到目前为止的经验表明，至少将近 40 亿人口所生活在的低收入国家和下中等收入国家，尚未很好地实现轻工业的充分发展，更遑论资本密集产业的重工业发展了。

四、没有后发优势可资利用时也应遵循比较优势战略

基于前面的分析，还可以得出更多关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之间关系的逻辑推论。

第一，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只要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战略，就一定能够顺利、充分地释放后发优势吗？如果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封锁，从而使得后发优势只是镜花水月，怎么办？樊纲（2019，2020）两篇文章中均指出，中国当前和今后发展阶段上面临着发达国家日益严格的技术封锁。那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否应该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战略？

按照我们的逻辑框架，即使中国今后不能从发达国家模仿任何技术，一切技术都需要自主研发，那中国也应该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不过，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和技术劳动密集度，要远低于改革开放最初 20 年的情形了，但显然会高于当今发达国家如 G7 的水平。

第二，设想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一开始就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利用后发优势，而喜欢一切自力更生，把一切轮子都重新发明一遍。即使在这样极端的情形中，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也会比不遵循来得更好。理由如前所述，遵循比较优

¹² 同上一个注解。

势发展战略，则企业具有自生能力，政府不需要对经济体系和价格信号进行全面扭曲，资源配置效率始终处于高水平上，资本相对于劳动力而言才能实现最快的积累，从而更快地迈向更高端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否则，反之。

第三，后发追赶国家一旦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后，就不再是后发追赶的发展中国家了，也就不再具有后发优势了。这种情况下要不要继续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更广义地看，当今最发达的美国相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没有任何后发优势。那美国是应该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发展资本密集的产业、产品和技术；还是违背比较优势战略，发展劳动密集产业、产品和技术？答案不言而喻。由此也可以推断，美国最近挑起贸易摩擦以来，力图实现制造业回归。如果说美国大力发展高度资本密集、高度自动化的制造业的话，是符合其比较优势的，这样意义上的制造业回归，也是可持续的。但倘若美国试图实现回流的是劳动密集的制造业，¹³我们推断是不会成功的。或者说必须以很大的效率损失为代价，比如政府对劳动密集制造业大量补贴，才能实现。

五、落后国家快速增长对全球而言是正和而非零和博弈

樊纲（2020）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追赶而导致的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是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之一。樊纲（2019）也曾经分析道：“落后国家还得增长，还得在已经被发达国家占领、‘瓜分’了的世界市场上‘挤出’一个份额。……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就是研究落后国家在发达国家已经占领市场的前提下，怎么实现增长的问题。”

如果从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经济占全球的相对份额角度看，樊纲教授上面的看法是成立的，因为发展中国家如果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增长，那后者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份额必然会缩小。根据世界发展指数（World Bank，2019），目前的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 1960-2018 年期间人均 GDP 年均增速分别为 2.40%、3.17%和 2.27%；目前的低收入国家 1986-2018 年期间人均 GDP 年均增速为 0.89%。可见过去半个世纪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增速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同期人口增速快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前者的 GDP 增速就会比后者更快些。这样一来，发达国家经济占全球的份额就会缩小。按官方汇率折算，1988 年低收入、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国家 GDP 占全球份额分别为 0.5%、4.4%和 11.5%，发达国家占 83.6%。到了 2018 年，四类国家的份额分别变为 0.5%、5.6%、21.4%和 72.5%。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上中等收入国家份额的提高幅度，差不多就是高收入国家减少的幅度。

但是，相对份额缩小是否构成樊纲教授所说的发展经济学“特征性问题”之一，除了要看相对份额外，还要考虑到全球经济总蛋糕是否增大的因素。这个因素背后的实质，则是发达国家自身技术进步是否停滞。倘若发达国家自身技术进步停滞，那么，全球经济总蛋糕增速就会大大放缓，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不仅仅在相对份额意义上挤占发达国家占领的市场，还会在绝对量意义上挤占发达国家的市场。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发展带来的就不仅仅是和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那么简单的事情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国际关系的宿命了。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期，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全面封锁技术输

¹³ 这实际上是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

出，发展中国家也就谈不上任何后发优势了。倘若真的如此，那发展中国家就发展无望了吗？我们认为，除非发达国家凭借武力彻底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否则，后者即使没有任何后发优势可资利用，但只要采取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也能够依靠自己力量把所有轮子重新发明出来，假以时日，也能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凭借自己内部不断成长的市场容量，把自己的产品消化掉。这意味着从全球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发展会在绝对量的意义上把自己的蛋糕做大，同时在绝对量意义上把全球总蛋糕做大，而又不会在绝对量意义上挤占发达国家的蛋糕；当然，会在相对意义上挤占发达国家的份额。这是我们的框架中得出的逻辑自洽的推论。

如果我们放弃上述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停滞的假想，而是充分认识到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在持续进步的现实，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对全球而言就更是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了。

正确地看待上述问题，在当前国际关系形势下的重大意义在于，促使发达国家正确对待全球化，正确处理国际关系，以积极的态度和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否则，如果不能正确地看待上述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全球而言是零和博弈，进而以零和博弈思维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限制技术输出，在自己国内生产本可以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产品，那么，不仅发展中国家受损，发达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也会受损，可以用于研发前沿技术的资源也会减少，长期福利必然也会受损。樊纲教授指出：发展中国家达到最高发展阶段，“成为世界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后，所应该有的态度和做法是：

“不可能一个国家制造所有的东西，应该通过开放的世界体系，各国之间专业分工、相互贸易，这样才更有效率。”¹⁴如果说达到最高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这样的态度和做法的话，那当今的发达国家就更可以以这样的态度和做法，来处理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六、总结

樊纲教授的两篇论文，在发展经济学应该如何确定自身研究主题方面，进行了很好的探索，并提出了不少理论观点。我们赞同其中不少观点，但也对其另一些观点持有不同看法。本文中我们着重阐明了，虽然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并非不同发展阶段上继起的互不相干的两件事；唯有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才能顺利地充分地释放后发优势。这正是破解樊纲教授所说的“发展悖论”的“发展的机制”。

樊纲教授的两篇论文，还涉及到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特征性问题。基于有限的观察和学养，我们想补充的一个在理论上饶有趣味、值得深入研究的“发展悖论”是：凡是成功实现追赶的发展中国家，在生产率高速追赶过程中都伴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比如日本和韩国在上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高速增长的同时就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我国在过去 40 年的高速追赶期，贸易条件的大体变化趋势也是趋于恶化的。按照直觉，贸易条件恶化是不利于财富积累的。那为何贸易条件恶化却没有拖累经济追赶？是因为发展中国家高速追赶过程中的出口品，在发达国家市场中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大，进而拉动发展中国家总出口额快速扩张吗？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¹⁴ 樊纲 (2020), 38 页。

参考文献

(1) 樊纲: 《“发展悖论”与“发展要素”——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案例》, 《经济学动态》, 2019年第6期。

(2) 樊纲: 《“发展悖论”与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 《管理世界》, 2020年第4期。

(3)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4) Feenstra, R. C., Inklaar, R. and Timmer, M. P., 2015,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5(10), pp. 3150~3182.

(5) Lin, J. Y. and Tan, G., 1999.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2), pp. 426~431.

(6) Lin, J. Y., 2003, “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1(2), pp. 276~308.

(7) Lin, J. Y. and Wang, X., 2017, “The Facilitating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Man and the Economy*, 4(2), pp. 1~19.

(8) World Bank, 201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